



自然大学创办亲历记/ 当爱好变成责任/ “短跑选手”向“马拉松选手”致敬
展览：黑暗中的对话/ “以身试法”推进公民社会/ 推荐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访公民调查志愿者

@民間
行动改变生存

2009年第三期



@民間

第三期/2009年

在线阅读\下载: atminjian.ngocn.org

博客: zaiminjian.ngocn.org

联系邮箱: zaiminjian@gmail.com

情感的力量

文/本刊编辑部

你不爱他（她），也许只是因为你不了解他（她）。

那些投身于保护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的人并非天生，总有某些东西挑了他们的神经。其实公众中蕴藏的环保能量是巨大的，但需要用某种方法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于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发起创办了一所自然大学，以自然为课堂，向自然学习，通过高频率的走水、观鸟、认植物等活动吸引公众，在学习求知过程中恢复对野性自然的情感。

就像一个平静的长镜头，长久的关注下，你终于明白那里面有血肉。志愿者们想方设法获得、每天埋头整理的就是一份名单，就是一个个个地震遇难学生的名字这是有温度的。所以，他们才会在质询的目光中反问：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因为这份温度，大学生云迪创立了“为美国而教”项目19年来影响甚远安德亚·海勒奇，在德国办起名为“黑暗中的对话”展览，健全人体会盲人的世界也让盲人获得尊严本期“接点”，你会读到他们的勇气与智慧。

但是，当情感的冲动变成责任，又该如何承担。“智人慧心”助学网站创办人野火寒烟的困惑与抉择，相信很多人会有同感。也让支教志愿者这些“短跑运动员”，更加钦佩扎根乡土的“长跑运动员”

无论如何，请相信情感的力量，这是我们的行动的加油站，也让这行动离功利远一些。

• 目录

民间报告——焦点

自然大学创办亲历记

(冯永锋)



图：城市居民对高压线挥之不去的恐惧

P01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访公民调查志愿者

文/艾晓明

艾未未以公民姿态发起的对川震灾区遇难学生名单的调查，充满了前卫的艺术精神：第一，挑战禁忌；第二，身体力行；第三，社会参与……

P09

公民之声——观点

转型中的中国更需要公民社会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三）

文/陈健民

P13

“以身试法”推进公民社会

文/李大同

“志愿者”这个称谓，印象中多指那些热心慈善、环保的人们，譬如四川大地震时大批志愿者主动奔赴灾区参与救助，令人感动，媒体曾将这称为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开端……

P15

“短跑选手”向“马拉松选手”致敬

文/谢进

P17

全球公共生活——接点

“为美国而教”的影响力

文/谢家驹

她是“为美国而教”的创办人，现年仅四十岁，可能是100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是笔者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企业家中最感人及最具启发性的一个，甚至超越诺贝尔奖得主尤劳斯……

P19

展览：黑暗中的对话

文/Tse Ka Kui

P23

思考感悟——茫点

当爱好变成责任

文/野火寒烟



图：作者与孩子们

P25

野花烂漫——彩点

为中国而教

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供应链劳工状况

看一看江河源头

红色推土机

请对历史负责

P29

推荐

《环球慈善》杂志

《带着环保游戏去旅行》 自然之友

《采访本上的城市》 王军著 三联书店出版

《上访》 纪录片 赵亮导演

“不许联想” 博客

P33

追踪与反聩

P22

封面图：庠水 丁正献/1943年

如果你上过大学,你应该上自然大学;如果没上过大学,你更应该上自然大学。

自然大学没有教室,没有教材,却有着水学院、植物学院、鸟学院、摄影学院、城市环境学院、新闻学院和研究中心。走进自然,向自然学习,你可以是老师,也可以是学员。你可以在任何城市创办分校。如果你愿意了解身边的自然,你就会想爱护它。自然大学希望唤醒公众对自然的感情和行动,而不仅仅是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在埋头苦干。

本文是自然大学创办人、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的自述。

自然大学创办亲历记

文/ 冯永锋

2009年5月10日,晚上10多点,我搭乘300路公共汽车回家。车站离家还有一段路,我慢慢地走着,道路清凉,心中有些高兴,又有些起疑。

下午,在自然大学北京乐水行的讨论会上,我用一个新词来概括自然大学的精神:助人成事。接下来,关于自然大学城环学院的小讨论会,我发现,激发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民间环保组织在方法上,会出现些新变化。

打破阻隔态,激发沉睡者

2006年8月份,有一种理想激荡着我。我在兰州的黄河岸边行走。这条河岸,在中国不算最脏的河岸,因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把垃圾扔到河中,扔到低洼处。穿城而过的黄河在兰州成了污水收集场、垃圾堆放场和粪便集中营。所有岸边人家的厕所都通向黄河所有排洪沟都成了污水沟,所有的垃圾似乎都扔到了河里。

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的顶着太阳贴着黄河走,一路躲避垃圾和污水,一路观察简陋

的厕所如何相互接应。兰州正在开展“黄河风情游”,有人在河里坐羊皮筏子,有人坐牛皮筏子,有许多人光着脚撸起裤管,下到水中嬉戏;更多的人坐在水边,喝着啤酒,嗑着瓜子,享受着河流之美。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们与污染共生活人与生态伤害共存亡。人们制造着污染同时为污染所害,人们对污染偶有怨言但又对污染极少在意。

于是很容易就泉水般冒出念头:有没有可能组织大家去“直面污染”,并把污染拍下来,绘制下来,收集下来?

写下创意书,与朋友们讨论了许多次,有人担心“直面污染”这样的词容易引发社会警惕,建议改用一些面容姣好之词。

2006年12月份,似乎也是在300路公交车上,我想到了“自然大学”这四个字,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环保组织,组织当地公众“去自然上大学”。

2006年12月份,似乎也是在300路公交车上,我想到了“自然大学”这四个字,也许我们可以通过环保组织,组织当地公众“去自然上大学”。

于是就是有这句话:向大自然学习,在大自然中学习,以自然的方式学习。

于是有了四个理念:持续性、开放性、公益性、本地性。持续性是希望每周都有活动,并且有与自然细节相对应原足够丰富的活动,比如水、鸟、植物、土壤、星空、云彩;开放性是把所有的信息让更多的人知晓,激发其参与;公益性是鼓励大家跳出自私,以公益之心去关注环境;本地性是最重要的,因为必须培养本地人关注本地环境的精神和方法,让更多的本地人成为公民环境专家,让更多的本地人成为公民环境记者。

于是有了打破四重阻重的文化修饰:打破人与自然的阻隔,让自然细节进入你的心灵;打破人与人的阻隔,让陌生人成为你的朋友;打破人与事的阻隔,让“与我无关”之事“与我相关”;打破人与美好情感之间的阻隔,让美好能力不随年龄的递增而衰减。

需要找到合适的环保组织来做这个项目

我无枝无叶,没有钱,没有经验,只有一个空空的想法。有一定经验的环保组织也没有多少钱。唯一可把这事做起来的方法是先无成本运行,然后再低成本运行。

敢于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相信中国的社会不缺乏能量,只是能量太多处于沉睡态。假如自然大学的活动能够慢慢地把一些能量激发出来,那么就是最大的成功。在我眼中,所谓的能量包括资金、场地、资料等物质层面也包括管理、智慧、经验、意愿等文化层面中国有太多的能量,处于乱花费状态,中国也有太多的能量,处于淤积状态。因此,自然大学项目本身,不是创造能量的过程,而是把沉睡能量激发并导流的过程,而是把邪恶能量纠编并健康化的过程。

我相信自然大学对增持环保组织的能量也有益处。

从水做起,扎根当地

不管怎么样想着无成本,总得有些人出面来组织,总得有些机构出面来担当。因此与自然之友、厦门绿拾字、甘肃绿驼铃、南



图:自然大学的学员们

京绿色之友、天津绿色之友、大学生绿色营绿家园志愿者等多次讨论，形成了一些文字上看起还算可行的方案。

当时觉得最理想的是由自然之友作为全国总牵头单位，然后各个城市各寻找一家到两家环保组织或者环保团体来运行各个本地项目。2007年春节之后，自然之友传来消息认为这个项目过于庞大，自然之友没有能力牵头，建议我寻找其他更合适的单位；自然之友愿意在“北京分校”做些尝试。

于是去找了北京地球村。廖晓义非常爽快，拉着我的手，到了当时的项目官员张凯办公室那，说，这事能牵头就牵头吧，反正也不需要什么成本。于是，一个多家共同发起的项目就算浇了定根水。其实，没有机构也一样，网络时代，通过网络就可自组织。有人说，自然大学本身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机



图：北京乐水行探路队队长张峻峰

构？我知道这都是可以的，只是觉得在能量不足的时候，一是把能量用到合适之处，二是尽量激发更多的能量释放并涌入。

自然是庞大体，哪道门尚未打开？观鸟植物此前都有人在做，也许可以从城市的身边之水去先流淌起来。2007年3月9日，自然之友项目官员李洁建议，先试一次水。于是我们一起从中轴线坐快速公交，到永定门，然后顺着南护城河往西走，一直走到了莲花池我们顺着干涸的河床走，我们顺着硬化的两岸走。我想让大家看看新修的永定门，想让大家尝尝我多次报道过的快速公交。

试走完后，李洁说，啊，这么简单的事就顺着河走，这事自然之友可以做。

于是，2007年3月17日早上8点半，城市乐水行正式开始运行。李洁通过手机短信通知了很多人，自然之友网站发布了通知，有将近二十人赶到集合地点东直门18路汽车总站。这一次，我们走的是亮马河，由于途中没有饭馆，也不知道何时停止合适，我们到下午三点才吃上饭，才解散队伍。

领队是张峻峰，他从2004年起一直在考察北京的水库，也一直在考察北京的水。他大概是最熟悉北京之水的行动者，是中国著名的民间水专家。绿家园的召集人汪永晨、中国环境报记者丁品、北京水专家王建、摄影师白桦也来参加了活动。

最晚到达的是张祥，他从丰台区赶来，他是从自然之友的网站上看到通知的。从此以后，几乎每期活动他都参加。2009年5月1日

60岁的张祥，正式担任乐水行的项目官员，当时有一个理想，是把自然大学办成永久的大学。因为河流永远在那里，人群永远在那里总有人需要了解河流，总有河流需要人类的了解。张峻峰喜欢说，每个周六都走水，风雨无阻，逢年过节也不取消。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积累，有了持续几个月的紧张调试，我开始放下心来，相信自然大学能够成立。参加的人成立了邮件组，愿意帮助推进项目的人心里充满了警惕。大家不停地修正错误，遇上问题就开会协商。慢慢地，有很多人愿意来参加自然之友与绿家园共同主办的这个活动。

所有的人都可以来，所有的人都负责自己；走水过程尽量安排自然讲解、文化讲解和社区访谈，在有检测药具的时候，做一些水样的检测；在携带GPS时，对一些排污口进行定位。

马军所带领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也很支持这个项目，他们在“中国水污染地图”上专门给乐水行开设了BBS，通知在上面发，感受也在上面展现。

中国的许多环保组织不关注当地环境事务，因此，我相信这个项目有利于环保组织扎根当地公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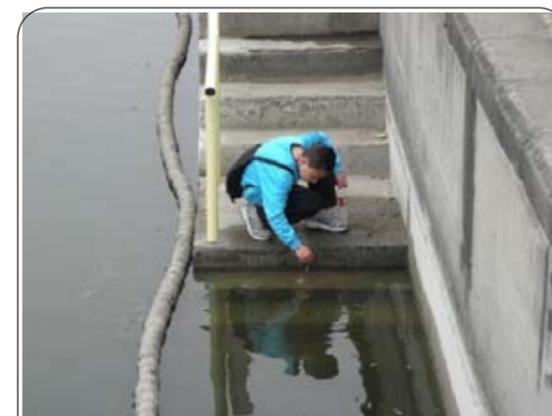
环保组织是理想的公众环保能量激发器和聚拢器，因此，我相信这个活动既是疏通社会经络的过程，也是汇聚社会能量的过程中国人自古缺乏观察自然的传统和能力，因此，我相信这个项目有利于慢慢地培养更多

的博物学家。

中国的教育充满了功利性和投机性，我们想培养“无目的”的精神，培养“忘我”的境界。

中国的教育总是教室型和教材型，而我们想建立一种向大自然学习、以自然为教材的新教育模式。

中国的人总是在间接地听和读，我们想



图：小学员在取水样

让大家亲自去看，亲自去想。

有太多的环保倡导只敢面向小朋友，我们的项目想面向成年人；我们拒绝小手拉大手，我们相信只有大手才能拉小手。

有许多人相信接受教育是孩子们的事我们想激励大家终身教育、持续学习。

环保组织不是旅游团

一个人做一个项目，想得最多的当然是它的“扩张”。

既然是自然大学，总不能光局限于水，既然是环保活动，总不能只局限于“行走”。

总有人问我这个项目的产出是什么。我

想，每周能够有几十号人行走在水边，亲自看到水用心去记忆水之痛，用心去体察水之美，一周两周，一年十年，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产出。

但是仍旧不够，既然是环保组织的活动那么就有一些公益的成果；既然有那么多专家被慢慢地激发进来，由专家变成了公民既然有那么多的公民由志愿者、旁观者成为主动者、共担者；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每年出具一份当地水环境独立评估报告？既然我们看到了水的现实，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时把水之惨痛报导出来？

既然每周都要行走在河边，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巡河记录表”？既然那么多人都会拍摄，都会写文章，为什么我们不能开博客去传播？

所有的人都觉得应当有产出，大家的心都有些狂野。于是，2009年6月5日，第一份北京的水独立评估报告的雏形版，由乐水行团队编撰完成。2010年6月5日，第一份正式的北京的水独立评估报告，有望正式产出。我们曾经想编过北京水生态游线路图，我们还想过做北京水电子地图。

研究中心也开始缓慢启动。2008年11月份，由乐水行团队发现并参与的“老鼠药对城市生态的影响”独立研究报告，正式发布这是自然大学研究中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项目得到了北京地球村化学品工作坊的1000元小额资助，这个项目的意义在于正式证实了“研究与教学”并行的双轨制思路的有效

性。如果说每周的“走水”是一个无障碍的宽口径的公众参与环保通道的话，那么，研究小组则有利于一些小组通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而获得知识增值和境界提升。

2007年年底，我开始琢磨水学院之外，创建其他学院的可能。2004年底我开始观鸟因此与北京的民间观鸟团队比较熟悉，因此很



图：持续观鸟是了解鸟类现状的最好办法。

自然地想到了鸟学院。李强是自然之友观鸟组的负责人，他很明白我要办“鸟学院”的企图是什么，他也愿意把鸟类调查与培养更多观鸟爱好者结合在一起做。虽然他有时候也担心，万一参与人数太多，会影响鸟类调查。鸟学院的通知总是写得诱人，因此，很受人欢迎。

植物也是一个人必须认识的自然细节之一。我们每天走过无数的花草树木身边，可又似乎与他们隔着千山万水。这种无情的阻隔是由我们心灵造成的，也是由于我们对其不相识，充斥眼前却目无所见。自然之友的植物组也开办多年了，因此我想，有没有可能与其合作，大家一起把植物观察和本地植

物研究推动推动？

想法非常简单，一是尽量把通知开放给“陌生的公众”，而不是只通知少数人，这一点比较容易实现；二是保持持续性，至少每周一次，这一点有些困难。大家对持续性的理解不一，有人说，我们每年组织一次活动，每年都组织，这也是持续性；有人说，一个月组织两次活动，频率已经足够了，一周一次，频率太紧，专家太少，无法支撑。

但我相信专家缺少恰恰是活动频率不足所至。一个项目如果频繁不足，很快就会被公众所淡忘，其活动的能量和“产出”的效力会很快衰减。而如果一个项目保持足够频率的持续性，那么就是一种增持力，不仅会有更多的专家被激发出来，不仅会有更多的场地被发现，而且活动本身会培养出一批新的专家。因此，我一直坚持认为，每周一次的活动是基本的频率，如果可能，甚至需要更加的细密。

与擅长培养公众摄影专家的“野性中国”也开始合作。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影像来保护自然，通过拍摄对自然充满爱意的照片来延伸自己。2008年7月，自然大学自然摄影学院开学，一批有数码相机但面对纷繁自然无法下手的人，开始得到“野性中国”工作室自然摄影师的“持续培训”。

2009年4月11日，自然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开学。这个项目对自然大学的深度扎根有独特意义。城市环境学院关注的是城市化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比如汽车尾气污染、垃圾场

空气污染、电磁环境污染、室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我们先从大家非常关心的电磁环境污染入手。借来精密的仪器，发现“主动检测”的公民，联合有意愿从事这项事业的“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把环境与健康话题，通过项目的方式让自然大学与当地公众更加紧密。

假如说水、鸟、植物与公众的健康关系还不够直接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电磁环境、食品环境与人的生活高度相关。这个活动也是每周举行，每次检测一个小区，小区居民自己向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报名，同时需要发动10户左右的家庭参与。

达尔问求知社还有一间能坐下60人左右的会议室，准备从2009年开始，办成公民环保课堂，让水、鸟、植物、电磁、食品等方面的专家持续对公众开讲。理想的办法是各个学院各主持一天或者半天，可以办沙龙、开讲座、看电影、头脑风暴。我们甚至也想以后与社区关系好了，还可以把环保题材的影片送到社区去播放，而不是只封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图：2008年4月5日植物学院活动，参加者有老有小

“激发型社会生态”与“助人成事”

自然大学秉持的是“低成本运作”的信念，低成本并不是说想廉价生产，而是相信公众本身蕴含着许多能量，环保组织本身需要做的是通过智慧和项目，把这些能量激发出来。激发的成本是低的，但汇聚的能量却是庞大的、源源不绝的。

2007年9月份，中国科协以支持环境科普的名义，给了北京地球村5万元。北京、厦门、天津、兰州等城市分得了9000元左右。这是乐水行的第一项资助。

2008年5月份，Waterkeeper联盟以资助北运河保护项目的方式，赠款约13000美元；2009年5月份，决定继续支持一年，赠款约12000美元。2009年3月份，乐水行团队获得康师傅水公益创意大赛三等奖，有望得到10万元的奖金。



图：城市居民对高压线挥之不去的恐惧

这些钱怎么花？我的想法是很难以志愿者津贴、领队津贴的方式发出。因为周末的观鸟、走水、植物欣赏、自然摄影、电磁检测等是志愿的方式，给钱反而可能制造许多困扰，但可以配合的是传播一些环保书籍，环保组织有许多优秀国产环保书籍，而参与活动的人是这些书的最理想阅读者，因此，把自然之友、绿家园、地球村开发的环保读物通过这个渠道传播，应当是最理想的方式。

钱应当用来支持研究中心，应当用来支持在观察自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愿意去做一些研究以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的人。因此2008年的10万元支持了4个研究小组，2009年的20万元，准备至少资助10个以上的研究小组这些研究小组由参与者自己去发现问题和组织团队，专家团队评审通过后，就开始资助和支持。

传播的问题也一度困扰项目。邮件组当然是维护团队的最基础办法，但过多的发送容易引发接收者的不满情绪。各个环保组织的网站及时的发布也很重要。我一向认为环保组织应当与门户网站合作，因此，与搜狐、人民网等一直在探讨如何把活动信息和活动成果更加有效地发布。

对媒体则抱着最简单的态度。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自由采访，但我们不会为了采访而故意表演和设计。在我们眼中，几乎所有的人在自然界面前都是幼儿园水平，都不识自然真面目。因此，媒体首先是自然大学的学员。何况，现在是公民环保时代，即使你不



图：主动检测，主动求知，是获得真相的最好办法

是媒体，也可以随时实现传播。乐水行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几乎每一次都有媒体参加，有人来专心地来报道，有人则就是与我们同行。

项目管理最难的是如何从“独裁”走向协作。自然大学厌倦管理型和竞争型的社会生态，想要探寻“激发型社会生态”，因此，如何让所有参与者主动起来，愉快起来，比较困难。

许多人相信一个项目一开始的时候需要由这个项目的核心成员来把持足够长的时间否则项目就可能难以实现。但我总想在过程中发现“所有的可能”，因为自然大学的理念是“助人成事”。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世界，虽然仍旧存在着许多冰块，但破除这些冰块的办法不是硬砸，而是暖融。

有些人觉得自己能力不行，有些人觉得此事与我暂时无关，有些人不相信项目的发起人愿意“放权”，有些人觉得有些事只能

由某人出面才可能打通。

但这都不是其他人的问题，在于你自己是不是能够“无我”，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有发现他人才能、欣赏他人才能、激发他人才能的能力。

这一点我做得不够好。但我相信，“独立的精神，合作的态度”面

向自然、助人成事的理想，应当会在自然大学的项目兑现过程中，慢慢地得到锻炼。



图：在自然书院劳动接力

艾未未以公民姿态发起的对川震灾区遇难学生名单的调查，充满了前卫的艺术精神：第一，挑战禁忌；第二，身体力行；第三，社会参与。

渺小而固执的艾未未们，他们叫杨立才、赵颖、郭克、马郡、杨瑞豪、王荔蕪……总之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后去灾区一百多人次，每个人都像个蹩脚演员，说着同一句台词：要名单。在四川省，教育行政部门、各乡镇学校和警方都捏着户口本、学生花名册人家就是不给你；有警车追逐、有警员设防、还有旅馆、网吧驱逐、清查……可是他们不依不饶，兢兢业业，在5.12周年祭之际，公布了五千多个名字。

本文是对参与这次公民调查部分志愿者一次访谈。

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访公民调查志愿者

文/艾晓明

问：请问你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呢？

一位普通话带西北口音的志愿者：看一下，这是我们目前做的核对的名单，大概最初的时候艾老师就在关注这个遇难的学生，他就是想了解一下学生的名单，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最后就决定——最初我们是向政府，以为政府会提供这么一个名单——向政府去咨询。我们想要到这个名单，但是没想到，比我们预想的要非常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做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不到，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官方的渠道，去取得这个我觉得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的真相。

问：你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遇难学生的名单。

问：为什么你们要这个名单？

因为我觉得死亡对一个人来说，就像艾老师说的，一个娃娃他活了三天，他也是一个生命。艾老师最早也亲自去了汶川那边，他触动也比较大。就想做这么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一个触动。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我觉得这是个……就是想知道。也正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中所遇到的困难，让我们更加想得到这个真相。

问：为什么想得到这个真相？

就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本身这是一个天灾，而且政府是应当把这个东西公布的。



问：那么你们在打电话调查的过程中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是不知道。

问：你们打了多少电话？

很多的，好多通。

问：你的基数是从哪里来的？

网络上都不太确定，我们就是一种民间的方式。

问：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收集名单？

有的是网友提供，还有的是我们的同事下到四川实地调研。

问：整理这些名单你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最早在没有做这个工作之前我们了解到的地震在网络上就是一个数字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对很多人也是这样，触动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切肤的。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当然有遇难学生的照片有遇难学生的家长对遇难学生的描述。比

如说有一个孩子，有什么特长，歌咏比赛得了多少奖，他是多么活泼可爱。这是家长对他孩子非常主观的描述，但是在我整理的过程中，我就非常的、比原来我在网上了解的到的、更加的切肤之痛。

还有这么多的名字，当很多名字堆积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忘不掉这个事情。因为地震的时候我在学校还没有毕业，就是从网络

上，还有从我们同学的一些反应上，都是从这些来了解一些感受，我们当初以为是很有感触的但是发现之后就会慢慢地忘掉。

现在我觉得已经可以忘掉这件事情了我觉得人真的是非常善于遗忘的。但当这个事情你又切实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件很大的事情总的来说，跟艾老师做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

问：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你参与这个志愿者工作的感受？

一位普通话带广东口音的志愿者：以前更多是旁观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参与得很少只是昨天整理了他们一部分名字的时候，其实做一点点事情就发现，那个需要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在艾先生博客上看到那些名单，可能我们很容易、几秒钟就把他的一篇文章看完了但是我知道我每天晚上都有过来，看他们工作（他们）都是非常卖命地做这么小的事情，为了很多人的一个公共事件，他们把自己很多个

人的时间都赔在上面了。

但是我看他们都很愿意，是真心地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了解关于什么官方的报道，关于四川的这个事件都不多，无论从哪里得到的都不多。我只看到最近反而有很多人去关注艾先生所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他在努力吧。我的想法就这样。

问：你觉得寻找这个名单有什么重要性呢？

什么重要？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重要吗？如果是，我要看到底是谁问这个事情。我要问一下他，问一下观众，你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吗？如果你觉得不重要的话，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是多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重要，你自然会去参与，会去想怎么样去帮助这个行动……

很简单，我觉得这是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就这么简单。什么意思呢，很有温度——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情怀，很有温度，不是冰凉的一件事情。

问：你在整理这些名单时你想到了一些什么？

另一位带点南方普通话口音的志愿者：我想到很多人。因为我去过四川，见过那些孩子们。这么大的，十七八岁，或者更小的十五六岁。我也是从孩子长大的，我没必要说那么多天真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温度，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没了。

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名单是重复的我们需要标出来，就是可能会修改一些。这

是修改的名单，可能是有误差的字。

他们没有做，我们替他们做，就这样。虽然可能是……我们尽量做到最好就可以，最后就算是提供一个档案吧。

问：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项调查？

艾未未：地震三百多天以后，“两会”的时候，四川省的副省长在谈这个地震问题的时候，发表了两个观点：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人数统计、学生死亡人数的统计上，他说太难了，说这事如何复杂。这个说法显然就是不合理的。那么怎么做才合理呢，我觉得这一切要基于一个很严格的调查，但这个调查首先又是不能由地方来组织完成的，应该是由比较独立的另一方来做。不仅仅是做，还必须公开。因为只有公开才有可能让更多的人进入，因为我相信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会关注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把它公开化。

问：公开化很重要吗？

没有知情权的社会，实际上公民是不承担责任的。不承担责任，当然也不能向政府问责，这样就给政府留下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从具体的事情来做起。具体的事情就是你尊重个人自己的情感、直觉和最简单的伦理判断：对、不对，是、非还有事实、真相这些最基本的概念，然后付诸行动。因为关于这个体制也好，关于这种落后的局面也好，还是很差的这种执政的方式也好，实际上是所有人都明白的事，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是关于一个公民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如何付诸行动，如何使个人成

为社会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去做，把它付诸行动这个是由于长期的社会的封闭，使大多数人丧失了这个能力。有的是来自政治上的原因有的是来自经济上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有观点的人已经是很少了，但是有观点、有行为去承担责任的人可能就更少了。

问：你们的志愿者是怎么行动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良知。我们的志愿者每个人都做了很好的心理准备。他们都是真正的志愿者，他们都是了解社会的人他们并不是一个盲目的、冲动的人群。所以我也同样地告诉他们，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我们只找死者名单。我觉得没有任何人有理由停止住我们这么简单的要求。你只要去想：这个死者可能是你的妹妹或是你的弟弟，那么你会在任何权力面前退缩吗？我想没有任何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当的行为。



问：做这样的事情经常会有挫折感吗？

挫折感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但是也会有满足感，你会发现有同样的人关心着同样的事情，有时候你可能听到网友的一句两句的留言，然后你就觉得很智慧，你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因为从他看问题的角度判断，你可以看到这种人性的温暖和色彩，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中国人有时候你会说很柔弱，但其实又很坦然、又很有忍耐的这种精神，很无奈。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感人

后记：

在草场地和四川实地调研的志愿者们拓展着这个社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在四川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的名字，还有自己确立人格和独立心性的历练。在与僵化体制的对抗以及角色扮演的肢体冲突中，志愿者们把知情、参与和监督的理念带入了重建的社区。

我在整理这篇采访录时，艾未未与志愿者们又发起了新一轮公民独立调查。这次调查的焦点是有关川震倒塌学校教学楼的建筑质量，而在5·12周年祭时，四川方面已经明确宣布，没有发现倒塌学校有豆腐渣工程。



转型中的中国更需要公民社会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三）

文/ 陈健民

公民社会的概念，过去几年在中国也开始热起来，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概念对应着当前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公民社会着重人的自由和权利，正是对应着中国传统社会太过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权利没有适当的尊重。改革开放之后人的自由空间扩大了很多。西方有时候看不见很多时候以为中国老百姓很苦，没有什么人权自由，其实我们也知道不是这样的。

当个人的权利和集体有冲突时，个人权利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呢？不一定。改革开放好像是释放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又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个人和政府是不是在法律上并列站着呢？不一定。所以

就变成很多时候出现官员滥权、腐败等问题过去十多年社会经常谈到维权，这跟公民社会对自由权利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公民社会理念可为老百姓进行维权、监督政府提供一种精神支柱。

另外一点是参与。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以前的社会是相对整合的，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单位进行管理，因此单位变成了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把一些公共的问题处理掉。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单位制度渐渐就崩溃了，我们现处于“后单位时代。以前很多公共问题如卫生或治安会由单位来处理现在没有单位了，就需要当地的居民、业主一块来合作处理公共的问题。公民社会强调要

合作、要参与，正好对应着转型中的中国如何重新整合社会的问题。

第三，公民社会培育的公民性，如参与和宽容等，正好对应中国面对的价值混乱甚至失范的问题。譬如在做义工的过程里，人们学习将目光移离自我的世界去关注更广阔的问题。参加义工也可以学懂怎么处理公共生活的问题，如怎么处理矛盾的问题，如何文明地跟别人辩论，如何协商妥协。更重要的，是通过公民社会，人们可以建立一些新价值、新规范。

社会学家说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社会失去规范的状况，譬如说很多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小孩好。其实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就会出现旧的文化、价值和规范在新的社会里不能使用的情况，家庭作为一个“社教化”孩子的地方，已没法满足公共道德教育的功能。在公共生活中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等，家庭伦理已不足以应付公共生活的挑战。而公民社会包括行业组织、居民组织业主组织等，提供一个场所，让该领域的成员透过互动慢慢发展一个规矩出来，通过这个过程，人参与当中，学懂在这个领域里怎么处理公共问题。简单来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和教导我们新的公共道德。在西方或者香港，公民社会在这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公民社会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沟通对话。德国社会学家哈贝玛斯批判现代生活太过受工具理性影响，就是说我们不谈目的

只谈手段，很多事情好像已经不用再问其价值，而只问怎么做最快、最有效。工具理性越来越厉害了，我们都谈效率，为了效率可以牺牲很多其它东西。

在现代社会里，工具理性发展出一些大型的组织，如政府、医院、工厂的规模愈来愈大，为的是更有成本效益地生产和服务，但由于大组织有太多规章制度、严密的等级人在其中，很多时候感觉到没有办法影响到整个组织，个人就像是大机器里的小螺丝这样的情况下，人的自由、自主性和创造力就受到压抑了。企业是工具理性的领域，要赚钱，这是很清楚的目标，不用再问了，只需要说怎么赚得快和多就行了。

如果工具理性慢慢渗透到我们其它生活的领域，就很可怕了，譬如说家庭、学校都以工具理性为做事原则就很可怕了，就不讲人情味了。公民社会强调要对话、要沟通，有一些事情在公民社会里可能做的过程比较慢的，但却可发挥参与的精神。

公民社会有时候做事情会比较慢，但它对个人的尊重，强调平等对话、真诚沟通，和给予一般人贡献智慧、参与创新机会，使人在政府和市场以外，活得像一个完整的人而不单是一个工具。

陈健民，著名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关注公民社会，同时也热心参与行动。



“以身试法”推进公民社会

文/ 李大同

“志愿者”这个称谓，印象中多指那些热心慈善、环保的人们，譬如四川大地震时大批志愿者主动奔赴灾区参与救助，令人感动，媒体曾将这称为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开端，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近日，笔者在报道中看到，中国竟然还有一种志愿者，按他们自己的称呼，叫做“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他们的目标和行为，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经验。

48岁的吴君亮是深圳军亮管理公司的CEO，美国休斯敦大学政府管理学硕士，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的两个志同道合者李德涛和万宇涵也分别获得法国和澳大利亚，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他们可以说是专业人士。不过，这些“海龟”并没有只想着回国创业赚钱，而是想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推进中国的公共预算改革。自然，这个活儿没有一分钱可挣，还要自己搭进时间、经费。后来证明，还要搭上无

穷的耐心和坚持。

中国各级政府的开支，从来就是一个“黑洞”，从来都是暗中运作，没有人确切知道哪一级政府一年当中究竟收入了多少钱，又支出了多少钱；这些收入和支出里，有多少是合理合法的。中国的纳税人，根本没有可能去监督政府的花销，各级人大的监督，也纯粹是个摆设。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政府的预算，是一项庞杂和需要有精深专业知识储备才能搞懂的事务，深圳一家财务公司的高级经济师说，对公司的财务报表，“晃一眼就能看出问题在哪儿”，可她在担任人大代表“审议”政府预算报告时，感到“无所适从”。做了两届人大代表、身为人大预算小组副组长后，还是觉得“不容易提出深入的问题”，高级经济师尚且如此，遑论普通百姓了。

然而政府预算决不应该，是纳税人看不懂

的东西。吴君亮们要研究的，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看不懂。自然，第一步是要获得预算报告。2007年4月，国务院就发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预算和决算报告是需要主动公开的“重点政府信息”，必须向公众开放并提供便利的查阅条件，国务院发布的条例，各级政府会不知道吗？在经过一年的准备期，2008年5月1日条例正式生效后，吴君亮们立即向财政部、卫生部、发改委等十多个国家部委，北京、上海、广州等十几个大城市发出了获得预算报告的申请，多数部门和城市都有回复，但无一例外是拒绝，借口预算“保密”、“与你们无关”等等，这些官僚部门可以说是知法违法，他们就是不想让公众进入这个“禁地”，有的官员竟对他们说：“你们跟政府对着干，是没有结果的。”

然而，志愿者好就好在他们作某件事就不是出于功利目的，吴君亮们有足够的耐心，一次遭拒就两次、三次、四次，申请对象的层级越来越高，直至城市和部门首长。他们的执著终于有了初步成果，2008年5月底，深圳市财政局终于同意了他们的申请，他们将预算报告分门别类，做成了财务数据库，很快发现数十条值得关注的数据现象，而最让他们搞不懂的是无法知道各个部门为什么要花这些钱，部门的工作任务不知道，怎能判断钱是否该花，是否花得合理？也就是说，纳税人掏钱，向政府购买他们需要的公共服务，钱被收走了，要买的东西是什么却不知道，与深圳毗邻的香港特区政府公共预算报告，则将每个部门的每项工作

细化到了需要多少工时，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预算。香港特区政府的预算报告，虽然有1000多页，但没有什么看不懂的东西。差距太大了。吴君亮们初步估算，2008年深圳市本级预算中内容重叠的项目支出加上公车使用费，占到了部门160亿总预算的三到四成，按香港的标准，仅这些支出就可以砍掉大半。

吴君亮们有了初步进展，研究在继续。后来，卫生部终于也同意向他们提供预算报告与他们保持联系，并且有意向的城市、部门也在增多。很明显，他们的研究成果会不断披露会被媒体关注，会提供给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政府预算审查的委员们，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被发现，如果这样的志愿者不仅仅是吴君亮等几个人，而是每个省、每个行业都有，他们无疑会成为政府权力最有力的监督者，会成为亿万纳税人的眼睛，志愿代理他们盯着政府怎样花钱。

“以身试法”原意是明知法律规定却偏要做法律禁止的事，现在可以赋予这个词儿新的涵义了，那就是敢于依法主张、兑现公民不可被剥夺的权利，不允许自己的法定权利被官员剥夺、削减。这样的志愿者越多，中国离公民社会就越近。

李大同：前《中国青年报》冰点专版主编。

“短跑选手”向“马拉松选手”致敬

文/ 谢进

“我们的自由天空”公益助学项目组是一个纯民间发起的公益性志愿者组织，我们工作的主旨是为西部贫困边远地区中小学提供教育援助。

这次来参加乡村教师培训计划的老师们也有许多是来自我们的支教点，他们不仅长期工作在乡村教育第一线，也给我们的支教志愿者们提供了很多无私的帮助，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次能在北京见面，我们都感到特别的高兴。特别要感谢红十字基金会和崔永元公益基金发起了这样一个乡村教师培训计划，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和来自全中国最偏远乡村的老师们共聚在这里。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是好几天以前就从村子里出发了，先是步行，然后摩托车转小面包，小面包转大巴，大巴转火车，换了四五种交通工具，周转了许多次才最终抵达目的地。我也要向这些远道而来的，默默无闻奋斗在乡村教育第一线的园丁们表达最

深切的敬意。

“我们的自由天空”公益助学项目组的核项目就是接力式支教，以学期为单位，也就是说支教志愿者至少要在当地完成一个学期的支教任务，然后下一个学期由下一批志愿者接替他的工作。目前支教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已经完成了三期支教任务。我们的另外三个项目是：爱心图书项目、帮困助学项目和心理健康项目，都是围绕支教项目来开展的。图书项目的目标是在支教点学校建立图书室，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帮困助学项目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帮助他们重返校园。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向西部累计派出了近一百名支教志愿者，在三个省四个县的二十多个中小学中担任教学工作。在支教志愿者的教学、生活中，当地的老师也给了他们很多热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可能在当地顺利开展。

其实，我们的支教工作和当地教师的工作很像短跑和长跑的对比。短跑爆发力强十秒就跑完了，大家都喜欢看，热闹，也精彩；但是长跑呢？几乎没有人会守在电视面前看几个小时，看完一场马拉松比赛。支教也是一个看起来很有光环的事情，对于支教志愿者不管是媒体还是社会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很多的荣誉。他们在支教的一个学期里也几乎是倾尽全力去教学生，拿一个志愿者的话来说是怎么累怎么干。但是志愿者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那些数十年如一日，驻守在最偏远的山村里，默默送走一批又一批孩子的老师们才是乡村教育最坚韧和强大的根基。他们就像那些马拉松选手们——奥运会时我们在电视里都曾看到过那些马拉松获奖选手，他们通常很不善言谈，甚至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显得有些羞涩，不像短跑选手一样有明星风范——正是这样的人，完成了对大多数人来说根本不可能的几十里的跑步他们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师，就像马拉松选手一样，在乡村教育的赛场上坚守着，不去计较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把教育作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他们唯一的事业，很多人为此付出一生。“乡村教师培训计划”就是专门为这些老师们服务是为他们送上的一捧鲜花。

最后，我想说这样一个观点，萨特曾经在《上帝与魔鬼》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了善而善，只会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所有的善念都需要落在实处，从最现实的层面

做起。我们可以是理想主义者，但绝不是空想主义者。不管是公益，还是慈善，都需要踏踏实实的讲求实效，讲究方法，落到实处。

(本文摘自作者在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中的讲话)



(上接24页)

图：盲人向导们

展览：黑暗中的对话

四、以创意来创办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创办人海勒奇曾服务于德国失明人士协会，但他不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协助失明人士，反而别具创意地设计了这个“展览”形式来让健全人士去体会黑暗中的世界。

五、以特许经营的形式来办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已经证明是可以超越不同国界及文化，在全球不同地方来进行。海勒奇自己的公司是一个社会企业，但他并不要求每一个合作伙伴都是社会企业，例如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就是一家商业机构，但完全认同“黑暗中的对话”的社会使命。不过他始终喜欢与社会企业合作，因为能够更深更广泛地发挥社会效果。

目前在亚洲，韩国是第一个开展“黑暗中的对话”的国家，第二个是今年开始的泰国，接着是明年的新加坡，香港及中国的特许经营权尚在洽商中。

“为美国而教”的影响力

文 / 谢家驹

《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最近发表了2008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士”的名单,很多大众熟悉的名字都上了榜,例如普京、奥巴马、希拉莉、胡锦涛、达赖喇嘛、马英九等,但有些估计必然上榜的又不见踪迹,例如毕菲特、盖兹、尤劳斯等。有点难以相信细读名单,蓦然见到一个笔者唯一认得出是社会企业家的名字 Wendy Kopp。她是“为美国而教”的创办人,现年仅四十岁,可能是100人中最年轻的一位。她是笔者所接触到的所有社会企业家中最感人及最具启发性的一个,甚至超越诺贝尔奖得主尤劳斯。因为她是在城市长大的知识分子,她所建立的事业,你和我都有机会可以做。究竟她的事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云迪的故事

21岁的云迪,当时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她的毕业论文描述了当时美国教

育制度存在的一些不平等现象。美国人一向觉得追求机会平等是美国社会的一项核心价值,但事实是否如此?云迪看见在低收入及偏远地区的儿童,根本就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那些地区的学校资源缺乏,设备简陋,更重要的是无人愿意到那些学校教书,学校死气沉沉,全无士气及尊严可言,哪会教到好的学生。

这些学生本来就来自贫困的家庭,在那样的学校读书,肯定没有出路,到头来仍是在贫困中打滚,这又岂能说是机会均等?

云迪在论文中深刻地分析了这现象,她觉得问题不容易解决,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与其垂头叹息或是空口呼吁改革,倒不如问我们自己大学毕业生可以做些什么?结果她勾画出一个梦想,她觉得假若顶级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先不做其它的工作,而去贫穷、落后地区的中、小学任教两年,肯定会给这些学校带来希望及改变,学生学习因而会大大得益,改变他们的一生。这就是她的梦想。

梦想是否可以成真?

发过梦,写完论文,毕了业,一般人会很快连梦的内容也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云迪没有忘记。那反而成为了她的日夜所思。她面临一个抉择:收拾心情去找工作,抑或是放弃工作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把梦想化作一个可以一步一步去实现的愿景:几年之后,美国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每年有过千名愿意放弃其它优差,选择到贫穷落后地区教书两年,才决定下一步事业发展路向。

这是她觉得完全可以实现的愿景。她把把这个计划叫做“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



图:[为美而教]计划由一个大学毕业生创立 (彭博图片)

这个计划叫做“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意思清晰,振奋人心,亦是行动的号召。她希望参加这个计划的大学毕业生,不单可以教授学生,还可以感染其他的老师,更可以锻炼自己,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比城市大大不如的情况下生活两年,会是很难得的体会。她的理想是参加这个计划的人,不只贡献两年青春,更

会成为终身的教育改革推动者。

她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这计划首年就要有500名来自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参加。

志大才不疏

能够成就大事的人,通常都有大的梦想,这也许是所有企业家——包括社会企业家——的特征吧!但是会否志大才疏呢?当然有可能。且看这位芳龄21岁的云迪:她没有工作经验(如果不计算暑期工的话),没有领导过大机构(连志愿机构也没有),没有富有的父母(他们勉强可接受她毕业后不马上找工做),没有大型筹款的经验,没有面对传媒的技巧、没有商界或政界的联系,没有工商管理知识(她是念历史的)。

又再看看她需要的突破,假设计划首年有500名毕业生可以参加教书行列,她起码要做到三件事:

(一) 联络、挑选及说服足够的学校接纳这批毕业生。这些学校大多在偏远地区,沟通及交通都会困难,能和他们安排好一份有实质意义的教书工作给与这些大学毕业生,绝非易事,何况要有500个这样的职位。

(二) 筹募足够的款项以应付庞大的行政宣传、培训等费用。事实上,要多少钱才足够也无从估计。她定下了一个目标:首年二百五十万美元。

(三) 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号召其他一流大学生参与。表面看来,这是个无法实现的事。

论才能、论经验、论财力、论关系云迪有多少，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但她有的是一颗赤热的心，坚强的信念，无比的斗志。

历史，就是由这些人所创造。

迈出第一步

云迪知道，第一个任务是筹款。她到处向人请教，一个初成立的组织全无业绩可言如何在短期内筹得二百五十万美元。没有人相信这是可能的事，简直是天方夜谈。她没有气馁。她凭直觉，认为有钱的人只要知道这个计划针对什么问题、有何等的意义及迫切性，他们就会慷慨解囊。于是她找出一系列的清单包括慈善基金会、大企业、知名有钱人士等等然后直接写信给他们，发出数以千计的信。

然后，她逐个打电话跟进，约见他们。当然大部分信件都是石沉大海，打电话亦难以接触到当事人。她锲而不舍，反复跟进，结果皇天不负有心人，三个月后她得到了第一个十万元的承诺。这是极大的鼓励。她马上组织义工队伍，开始联络学校。虽然筹到的款项只及预

算经费的二十五分之一，但她已有信心，可以筹得不足之数。

接着她组织另外一批同学义工，到所有一流大学巡回介绍这项计划。她们都是高材生受到云迪的感染，协助宣传推广。云迪自己亦经常出动，到大学及学生组织演讲，接受传媒访问，撰文在报章杂志上发表。

筹备工作是巨大而艰辛的。云迪最大的长处，是能够用自己的真诚打动别人。她是整个运动的灵魂，她最重要的贡献是感染到为数众多的同学、朋友、新相识主动地各施各法为整件事尽力。

正式启动

不足一年，筹款小组果然筹到二百五十万元。1990年，“为美国而教”正式开展。第一批500名大学毕业生安排到贫穷地区开始两年的教书工作。他们在当地教书时，领取一般教师的薪酬及福利，并获得一个微额的津贴，可用作日后进修之用。同时他们，若在大学时曾经获得贷款，也可以获准延迟还款。

到了2000年，参与此项计划的人数增加到900人；2005年更突破了2000人。最重要的，是每年报名参加的人数亦按年递增。2001年，近5000人报名，录取951人；2005年，报名人数增加至17350人，录取2226人；2007年，18172人报名，3026人被录取。著名的大学例如芝加、哥普林斯顿、Amherst、Duke、Wellesley、Norte Dame等，有8—11%的应届毕业生申请参加这个计划。至今已有超过二万人参与，其中



12000人决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为美国而教”已成为吸引大学毕业生的—股新兴力量。2007年，它雇用一流大学毕业生的数目，比通用电器及微软这些大企业还要多。2005年一个独立的研究显示，75%的学校校长表示此计划的教师比传统教师更具教学效果。学生最显著进步的科目是自然科学及数学。

2007年，云迪成立了另一个组织——“为所有人而教”（Teach for All），使命是协助世界各地之企业家推行类似“为美国而教”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组织明确表明协助对象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组织或志愿团体，说明非有创业精神者不可以推行此计划。

年青人做大事

美国另一个可足比拟的计划，就是六十年代创立的“和平部队”（Peace Corps），安排美国人往发展中国家工作两年。但这个计划是由总统（肯尼迪）发起的，亦得到国会拨款来推动及管理。“为美国而教”则是由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青人所创办，更别具意义。

事实上，云迪的勇气及成就对美国以至世界年青人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一直以来，人们对年青人期望不高，甚至有负面的看法。但云迪的行动打破了很多关于年青人的成见，例如：

- 年青人不会有理想
- 即使有，也懒得去实现
- 年青人不能感染其他人采取行动
- 年青人不会接受理想性的号召

- 年青人不会构建自我延续的组织
- 年青人缺乏想象力去解决社会上的重大问题

云迪——打破了这些观点。很简单，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云迪。

云迪是一个年青的社会创业者，应否入选“100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并不重要，反正她的影响力正在全球扩散，

追踪与反聒

本刊第二期《社会歧视不是小事》一文中曾经提到，北大医学部的歧视性招生条款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在各方压力下，近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布了新的招生体检要求，此前被宣布为拒录、限录之列的乙肝携带者，体重超标、身高偏低的考生，现在均被允许入学北大医学部，专家认为北大闻过则改，对其他有招生歧视倾向的高校将起警醒作用。



展览：黑暗中的对话

文/Tse Ka Kui

随着经济的发展，伤残人士得到政府及社会人士关心及照顾也日渐改善。首先是福利，保证他们即使没有工作能力，也可以得到温饱及满足日常需要，进一步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或半就业机会，让他们尽可能自食其力，享受工作的成就感及尊严。

不过，即使如此，他们仍然要面对很多不平等的待遇，从接受教育、获得职业晋升机会，以至到使用交通工具，享受休闲设施等，他们都会感受到很多的不便及压力。

更重要的是，一般人对他们的偏见、成见、嫌恶及回避，使他们觉得被边缘化、被孤立，亦阻碍了他们与健康人士的沟通及交流。

在德国这样经济发达而福利制度健全的国家，亦只有15%的伤残人士有职业，社会上认为“伤残人不如健康人有价值”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观念上的改变完全跟不上社会经济环境的转变。事实上，观念上的改变不容易出现，既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亦不是政

府政策可以轻易将之改变。

“黑暗中的对话”

德国一位社会创业者安德亚·海勒奇（Andreas Heinecke）针对这个问题，探索出一个创新的方法，他称之为“黑暗中的对话”。

海勒奇设计了一个场地，他叫它做“展览”，有四至五千方尺，里面包括四个部分家居、办公室、公园及市中心。参观者要付入场费才可进场，在欧洲约为十五欧元。每次八人一组入场，用大概九十分钟走过这个展览场地。场里完全没有光线，由一位失明人士当导游，人们在漆黑中步行、经历、感受这个旅程，他们会听到各种声音，感到微风及温度，接触到不同的物体；在黑暗中，日常普通行为变了样，角色也被转换了，导游是他们唯一的依靠。

完成这个旅程之后，参加者对失明人士的世界有了新的体会。令他们明白到一个道

理：其实失明人的世界里，不是他们少了什么，只是不一样而已。

参加者以五大类人士为主：个人、企业及团体、家庭、学生、游客，全部须要预约在个别展馆，轮候时间超过一个月。

调查说明，100%的参观者在五年之后都不会忘记展览会和他们导游的名字，其中90%的人更加关注盲人的生活，52%的人向他们推荐这个活动，34%的人愿意再次参加，特别会带家人及同事来参加。

“黑暗中的对话”由于在德国异常成功海勒奇接受邀请在其它国家进行巡回展览所到之处，莫不大受欢迎，海勒奇灵机一触，何不把它发展为特许经营？到今天，已有二十二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特许经营的展览设施超过五万名参观者经历过“黑暗中的对话”。

海勒奇出生于德国的巴登，大学时主修历史，并拥有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记者，又担任过德国盲人基金会的副主任。2000年他创建了“推广社会公益活动协会”，2003年创建了“交流形式公司”。海勒奇近年获得了不少奖项，包括“2006年度德国优秀企业家奖”、2006及2005年“德国优秀社会活动家”、2004年“全方位设计最佳奖（日本）”等等，他可以说是欧洲知名度最高的社会创业者。



图：安德亚·海勒奇

五个启示

一、为失明人创造就业机会。“黑暗中的对话”至今直接创造了至少五千多个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让失明人士可以得到稳定的工作及收入。此外，间接地更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其它就业机会，因为不少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体验了“黑暗中的对话”后，对雇用伤残人士有了新的态度及政策，更乐意雇用他们。



图：培训活动

二、令人尊敬的职业。“黑暗中的对话”所创造的职业，不是一般为失明人士而设的职位（例如接线生等）而是令人惊讶、尊敬的职位。一方面令这些失明人士能够发挥他们的专长，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另一方面让他们受到参加者的尊重及敬佩，直接及间接提高了失明人士（甚至其他伤残人士）的社会地位，也让身体健全的人更珍惜他们拥有的一切。

三、改变人们对伤残人士的看法。“黑暗中的对话”更深刻地令参加者体会到伤残人士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有他们自己的特长不需要别人的同情、怜悯，但需要人家的尊重及友善的对待。“黑暗中的对话”就是希望达至这种移风易俗的影响。（下接18页）

编者按:

本文作者野火寒烟是一家民间助学网站“智人慧心”的创办人，工作之余做着让自己快乐的事情。2008年，她遇到了事业的瓶颈：一方面志愿者缺乏主动性，几乎独自承担网站责任让她感到无力；另一方面辞掉了正式工作没有收入又让她很焦虑。她曾一度想把助学网站关掉。好在现在她已经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招募了三位主动性比较强的志愿者，正在对他们进行网站后台操作流程培训。另外也找到了新的工作，生活稳定下来。

本文是野火寒烟2008年的发在自己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文后是一些网友的鼓励与探讨。相信不少朋友也有与之相似的困或与迷茫的时刻。

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一起成长吧.....

当爱好变成责任

文/ 野火寒烟

我遇到的问题，可能并不是大多数公益组织遇到的问题，因为我所了解的很多组织在创建之初都是由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共同创建的。他们也会有他们的发展道路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相似，却也有不一样。

我遇到的问题，经过这些天的思考之后发现，总结出来就两个，一是管理，二是志愿者。应该是相关的两个问题，密不可分吧。

我是“智人慧心”助学网站的发起人，一个很小的组织，两年多了。记得2005年国庆，粽子问我，为什么要创建这个组织时，我说，就是爱好，简单的爱好。而且我也并不想把这个组织做得很大，不想发展到很大的规模。我只做力所能及的，并且让自己快乐的事。

两年多了，坚持到现在，我已经由最初的爱好——这唯一的动力，变成了责任。我是一个凡事都过于认真的人，既然做了就想做好。

抱歉啊，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呵呵，刚才和粽子通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思路找不到了。

我不是一个善于管理的人，我做了六年的网页设计工作，这原本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职业。我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在网站创建了一年后，当网站帮助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当初招人只是想，一些工作分工出去，他们可以各自承担一些网站的工作，然后我做我擅长并且喜欢的一部分。

现在过了一年多，却发现事情并没有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志愿者们其实很好都不是因为一时热情而加入，然后草草就离开他们一直坚持着做具体的事情，例如认捐，例如催款，例如跟捐助人沟通。他们做这些具体的工作非常认真。

但是随着网站的发展，我发现我们更需要有组织策划能力的人，有主动性，主动地去思考，去承担一些工作，并且为着网站的发展主动地去提出建议。

开始我是希望在现有志愿者中发展出这样的管理者。我把事情分成一块一块给他们包括所有需要的资源与方法。结果尝试了好几次，最终我发现他们只愿意做自己原本做的那一部分具体的工具，而且他们很安于做那些工作。于是，网站的事情又全部落在我这里。

我不是一个女强人，呵呵，我也不是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不放手的人。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团队，大家都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努力，一起思考，一起讨论，一起做事情。有时候我看着其他组织，看着他们的团队，很羡慕他们，为什么一开始创建组织就是一群人在做，而不像我，到现在还孤

单的一个人去奋斗。

2008年了，这个智人慧心，我并不想有很大的发展，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做小小的事情，不想做很大规模的组织。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团队来做事情，等到哪一天我要退出的时候，这个网站还在。

给粽子打电话时，她说我的压力很大，是的，我现在失业在家两个月了，没有任何收入。我不想找正式的工作了，因为我永远无



图：作者与孩子们。

法平衡工作与公益之间的关系。公益，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忙网站的事。下一个月，我的收入在哪里？我在问自己的时候，却有永远也忙不完的网站的事情：新网站的功能要测试做好后要设置还要加内容，新学期催款工作的组织，山区志愿者要培训。我忙得像没头的苍蝇。

我说，2008年对我，及这个组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志愿者，是招募一些有主动性愿意承担和分享的志愿者。

我其实又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做。有时候甚至也偶尔想，是不是要关掉这个网站？如



果一个事业，给自己带来的再不是最初的快乐而是压力。只是一时的想，但心里却舍不得放弃，虽然这个网站跟其他助学网站比起来并没有什么特色，但这其实就是网站的定位，一个只做力所能及的事，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的网站。



不知道是不是心里给网站的定位，根本不适合社会的发展，或者从一开始就是个畸形的定位。我不知道。

可是我真的很想听听大家的建议，这个网站是不是该沿着原先的定位这样走下去这样平凡地走下去？我也很希望能够哪一天有人跟我说，他愿意加入，愿意把这个网站一起做好。

网友留言：

悠扬笑笑生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办，需要一个团队，关键是有同样志趣的人儿真的很难找。

寒烟，不要气馁，我们永远支持你。虽然可能帮不上什么忙。

迦叶

当爱好变成责任，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自己还没有修成正果，就在说要去普渡众生，那不是空谈？愿望好的，但还是要实际。

做好事不能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社会还是现实的，物价都涨了好多了。

野火寒烟

迦叶，呵呵，我想放手啊，可是这个放手如果是指把这个网站关掉，说实话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一步，是我自己能力不够，我就想办法招一些有能力的人，但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把网站关掉那我永远做不成一件事了，呵呵。

我正是因为知道不够能力，而且这不该是一个人的网站，所以我不停地从现有志愿者中培养他们，现在也想找一些人来一起建设。

钱展弓

我觉得如果做公益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就不好了，要么你就全心的投入公益事业要么你自己能把握好平衡的兼顾事业和公益总之要让自己快乐、开心的做事情！

t2000

寒烟，你最大的矛盾不是在于爱好和责任，压力也不是在与放不放手。

如果单纯是为了助学的爱好，完全可以个人行为去资助，目前有很多这样的人，所

以，你在决定建立一个组织的时候，即使没有明确要做多大多大，但是潜意识里已经有了要做规模的想法了，只是可能目前遇到了挫折而已。

一个组织做得大还是小，是看机遇，不管是大还是小，架构和管理都必须完善，否则关系到的不是发展而是生存，所以在你心里想，我不想做大，只想建立一个团队，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把这两件事情硬拉到一起来想，只会越来越混乱，因为你在建立这个团队的过程中，总会不段的重复提醒自己，我不要做大，那么就会很自然的给了这个团队组建设置的一个门坎，从这一方面来说，正如你自己说的，你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LOH就是这样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后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任，如果你的组织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志愿者，这是个不错的方法，你能够把自己放到组织外面去看，你可以看到自己组织的很多问题，同时也让自然淘汰从组织内催生一个管理者来，中国人大多习惯了真的到了群龙无首的时候，才会有挺身而出的人，所以我说的是放任，而不是放弃。放任是让它自由发展一段时间，给自己腾出时间来观察和思考，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第二种就是压缩规模，把目前的规模压缩到可以应付的范围内，这样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应该明白，助学是一种社会责任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公益的存在，只能填

补一小部分空白，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多帮一个人也改变不了一个现状，真的做不来可以少做甚至不做，但是这种不做也不等于就是关门，可以是先暂停发展新的，把原来的处理好，一个个环节理清，积蓄到足够的基础的时候，再开始。

当然，还可以选择放弃，关门，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初衷，不然的话，那发这个帖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同情，或者说是找一种安慰，那我发这个帖子就真的是浪费时间了。

思路

寒烟遇到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也做网站，也参加公益活动，面临的是同样问题——勤勤恳恳、工作认真的人很多，但是能把网站当作是自己的、主动去为网站出谋划策的人寥寥无几。

实际这符合金字塔原理，能为别人安排工作的是领导，只会工作的是士兵，领导肯定是少数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没经验，也没走出这个局面，我只有一条，如果没人向前走，那么我就继续向前走。恐怕这就是责任，推卸不了的。



图：志愿者们在路上



为中国而教

“我们的国家正面对着一系列挑战，正号召我们优秀的年轻人尽其努力，其中最紧迫的是差距愈拉愈大的教育系统！农村师资数量和质量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欢迎有理想有激情的‘你’，加入为中国而教！让我们一起，为中国而教！”

这是“为中国而教”项目的志愿者教师招募书。

“为中国而教”借鉴美国运作了19年的教育运动“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 的成功经验, 2007年5月成立于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2008年9月, 项目归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教育部共同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的国际农村教育与培训中心。它将每年招募一批有志于教育, 极具责任感和热情的优秀大学生, 在师资薄弱的农村学校和流动儿童学校任教两年, 在派出教师全身心投入农村教育工作的过程中, 开拓农村教育的新途径, 提高服务学校的教学质量, 拓展服务学生的成长空间, 为缩小教育的差距做出持久的努力和贡献。

第一批任教者将在今年9月派出, 服务于安徽省涡阳县和江苏省启东市吕四镇的学校。



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供应链劳工状况

当您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尽情挑选时, 可知道这些商品是由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也许这里面就凝聚着工人的血汗。

2008年7月, 北京、广州、杭州的9名大学生组成“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 对可口可乐装瓶工厂及供应商的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他们于当年7月至8月, 到广东以普通打工者的身份进厂打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 可口可乐工人处境相当糟糕, 特别是派遣工人。5家装瓶厂在不应该使用派遣工的主营岗位上长期、大量使用派遣工, 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 致使派遣工人的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如克扣或拖欠工资, 非法收取进厂费, 不买保险和职业安全缺乏保障等。

2008年12月12日调查报告在网络公开后, 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或转载。之后, 小组和可口可乐进行了沟通。但是, 可口可乐(中国)公司及被调查的5家装瓶厂

在回应中, 一直回避非法使用派遣工等实质问题, 未表现出足够的诚意来解决。个别装瓶厂悄悄改善了派遣工的待遇, 以应对来自外界的质疑和压力。

调查小组负责人杨郑君说, 他们也是受到香港大学生的启发。2008年4月, 一群关注内地工人情况的香港大学师生发表了, 五家港企有关工伤及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报告。



图: 2008年12月14日晚, 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在中央民族大学正式举行了关于可口可乐非法用工调查报告的发布会。图为小组的三位代表杨郑君(中央民族大学)、王伟和高雪雪(浙江工业大学)

详细内容请看“大学生关注可口可乐小组”
博客: <http://followcoca.blog.163.com/>



图：杨勇和伙伴们在修车

看一看江河源头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中国大江大河的潜在源头状况如何？横断山研究会科学家杨勇等一行人目前正在青海三江源头进行考察。

考察的主题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找水”，他们试图了解：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冰川面貌及演变趋势；西北地区冰川总储量及消融量（状态），冰川径流（河流）水文情势及蒸发现状；冰川径流（河流）利用现状及新疆坎儿井工程；几条沙漠河流消失的案例，如昆仑河、罗布泊、民勤水系等冰川河流蓄水工程的可行性。

那地方杨勇他们去了多次，但每一次，环境恶化的急剧仍然让他们大为震惊。

详细内容请看绿家园网站
(<http://www.greensos.cn/ljy/html/main/>)
江河信息导读：专题。

(图 汪永晨)



图：山上没有了雪，河里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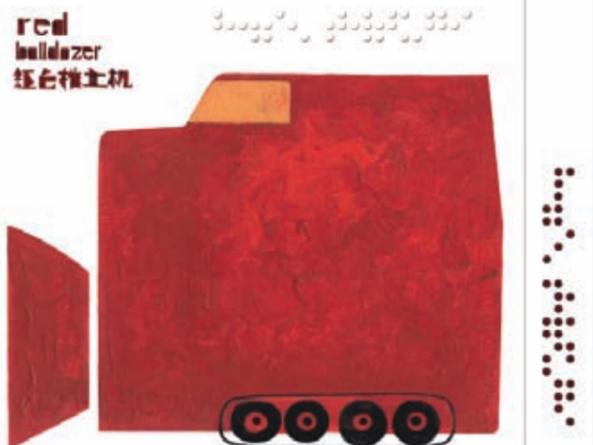
有了水阿里玛金山的主山脊上，已经看不到冰川的痕迹，见到的只是光秃秃的碎石山

红色推土机

“民谣歌手大串联，唱支儿歌给你听唱给暂时的黑暗，唱给永远的孩子”。

《红色推土机》，26个歌手，26曲童谣。如果设定每首歌都是颗行星，那么我们为之公转的核心，是一个等待帮助的孩子，他坐在黑暗里。每个孩子都是一轮太阳。

这张专辑是众多民谣歌手自愿无偿录制的，专辑收入将全部用于帮助贫困盲童，努力让他们生活有歌声有希望。



请对历史负责

位于金沙江中游的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因未经环评审批就开工建设并开始截流，今年6月11日遭国家环境保护部“叫停”。这张环保部开出的最大罚单仍未能让两家公司停下来，近日，25家环保组织和众多环境、生态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媒体人士、企业家、环保志愿者及金沙江边的农民签名呼吁“金沙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在呼吁书中，他们提出四条了意见：在目前龙头水库未定的情况下，建议暂停批准下游水电开发项目以免造成倒逼虎跳峡建坝的形势；在找出切实可行的鱼类保护措施之前，不应再轻易认定这些项目“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而对其予以放行；将环评前置到工程预可研阶段，在环评审批之前不允许进行三通一平、导流洞施工等实质性的工程建设活动；两家开发公司应严格履行相关法规，在完成环评报告并报请批准前，向社会公开环评报告，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同时环境主管部门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当世和后代守住环境底线。

呼吁书和签名详细内容请看链接：<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11492>

专辑的公益性质，并没有妨碍其音乐上的原创和探索，每个歌曲都体现了创作者的最新音乐理念。他们唱童谣，不是装天真，是向来时路的新的探险。

专辑涵盖了广阔的地域性，有南方五条人的客家儿歌，上海滩小毛驴陆晨，有新疆哈萨克的冬不拉，有邯郸乐派的小河与晓利。西湖与人的螃蟹和四川白水的螃蟹遥遥相望，张佺修理黄河边的水车，苏阳在贺兰山下捉蚂蚱，燕园里吕淑贤数星星，纳木错湖畔的盲女憧憬着她的金山之上。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这是一张中国的民谣地图我们开红色推土机，推动我们，推你们，推音乐推动生活。

(文 周云蓬)

推荐



《环球慈善》杂志

由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这本杂志，既有宽阔的视野，也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慈善公益新兴领域的问题。

《带着环保游戏去旅行》 自然之友

“一次旅行，2个游戏，3分钟就能学会！”礼物以外，我们能分享还有很多……在你出门旅游的时候，带上这本书吧，透过游戏，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棵绿色的种籽。

<http://www.fon.org.cn/download.php?aid=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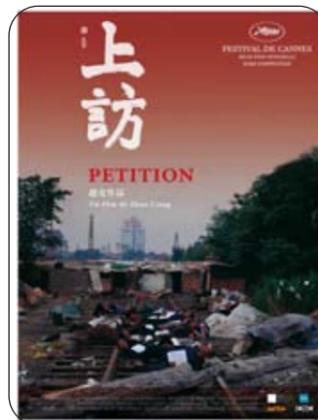
《采访本上的城市》王军著 三联书店出版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房危屋破一直是拆除北京老城区的理由，却少有人关心是何原因导致了老城之衰，以致于简单地把危房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等同于一个物质问题，以为推土机一推便可了之，殊不知问题竟是越推越多。《采访本上的城市》汇集了作者近十年来对中国及欧美城市的调查成果，书中直面当今中国的城市问题，对宽马路、拆迁经济等问题做出系统而深入的解剖；同时直击当前中国城市与建筑领域中的大事件、大热点，包括中央行政区外迁之争、国家大剧院、鸟巢体育场、CCTV大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等争论。作者均对这些争论作了第一手深入的调查。



《上访》纪录片 赵亮导演

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导演赵亮从1996年开始，十几年跟踪拍摄北京南站周围，被称为“第五十七个民族”的上访人。片子有12



2分钟和318分钟两个版本，其对上访人群体的悲愤、无奈与执着的真实记录极具震撼力。

“不许联想”

<http://www.wangxiaofeng.net/?p=3304>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的博客。拿足协说事儿最终落到劳动者权益上，深入浅出。



Everyone Can Be a Volunteer! EXiDEA 志愿者
www.exidea.org